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light gray with a complex, abstract pattern. It features a series of thin, dark lines radiating from the bottom center towards the top left,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design are various geometric elements, including circles of different sizes, some with internal crosshairs, and small 'x' marks. The overall effect is modern and artistic.

中国现代史

(下)

编者董原

目 录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 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起伏	1
九一八事变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	1
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20
文化思想上的斗争和左翼文化的成就	39
苏维埃区域革命的深入和各项建设的开展	66
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的胜利	78
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	92
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策略的确定	92
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调整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 一步高涨	106
西安事变 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26
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	155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 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

起伏

九一八事变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

一 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东北三省的沦亡

一九二九年秋，资本主义各国陆续卷入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是破坏力空前巨大的世界性危机。工业危机、农业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交织在一起，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价值二千五百亿美元的损失，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跌，银行信贷系统陷于瘫痪。危机使四千多万工人失业，几千万农民破产。

经济危机的发生，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为了摆脱危机，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专政，镇压革命，对工人和各阶层人民进行恐怖统治和残酷压榨；另一方面加紧对外的侵略扩张，准备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战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更残酷的掠夺。于是，德国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日本成为远东的战争策源地。世界面临着新的战争威胁。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早就开始了。甲午战争之后，

它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回顾和确定对华政策，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会议确立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最后形成了一个会议文件——《对华政策纲领》。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将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同年七月奏呈天皇。奏折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

一九三〇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一九三一年经济危机达到顶点。这次危机破坏性很大。垄断资本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同日本政府结合在一起，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危机措施，千方百计地将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恶果，转嫁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及中小企业主身上。据统计，一九三一年工人失业者达三百万。农民生活十分困苦。知识分子和城市劳动群众的生活也动荡不安。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充满着不安和反抗。面临着这种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反动统治集团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日本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来医治由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为了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在国内大造舆论，并大规模地扩军备战。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军费开支增为四亿五千多万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点八。它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大量输入军事物资，建立了一支以近代武器装备四平、凤城、安东等城市。九月侵占了辽宁（除辽西）、吉林两省。十一月

占领黑龙江省。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日军侵占锦州。至此，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三千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东北，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和全国各阶级，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国人民局部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二 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危机

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

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各方面纷纷发出通电，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召开了各界抗日救国大会，举行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和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上海九月二十六日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参加人数在二十万以上，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九月二十八日，北平各界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参加的有二百五十多个团体，约二十多万人。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定外交方针，认定日本为目前中国最大敌人”，实行“对日宣战”，在全国“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组织抗日义勇军”，“国内各方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上海北平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反日罢工。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三万五千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二十三家日资纱厂工人酝酿同盟罢工，工人纷纷退厂。日本

商号的店员和私人雇用的佣工也纷纷离去。十月初，上海八十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厂工人纷起成立抗日义勇军，要求政府发枪抗日。十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其它各地的职工也都以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活动。

青年学生在反日浪潮中起了先锋作用。各地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九月二十日，北京大学学生通电指出：“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作政府后盾”。九月二十五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和教职员电国民党政府，谴责政府和军队“一遇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九月二十七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主张工农兵学商“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成立全国的反日运动联合会，作为全国反日帝国主义的总机关”，“以群众的力量驱逐日军出境”，“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各地学生还纷纷向各地方政府请愿，并派代表或结队赴南京请愿。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学生派出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上海学生两千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请愿。请愿的学生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捣毁了他的办公室。十一月，南京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紧急动议案，“请蒋速北上，收复失地”。蒋介石也诡称“个人决心北上”。消息传出，南京及全国各地学生立即发起“送蒋北

上运动”。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南京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达两万多人。十二月初，因国民党政府代表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各地学生乃改请愿团为示威团纷赴南京示威。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学示威团在南京街头举行示威，被军警包围，学生被打伤三十余人，被逮捕一百八十五人。七日上海各校学生一万五千人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大学生，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九日上海学生上万人，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抗议国民党特务绑架由南京来上海报告情况的北大学生代表，迫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释放了北大学生代表，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接着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公审凶手，并捣毁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十二月十五日，北平学生示威团二百余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正在开会的蔡元培陈铭枢被推为代表与学生相见，学生殴打了陈蔡二人。十七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和南京学生共三万多人，联合举行大示威。当示威队伍走到珍珠桥时，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血腥屠杀，当场有三十多名学生被杀害，一百多名学生受伤。当夜国民党政府又派出大批军警搜捕学生，并以武装押送各地学生返回原地。这就是南京珍珠桥惨案。惨案发生后，各地纷起抗议，上海学生工人和市民抬着死难烈士的棺木举行了十万人的示威游行。

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也起来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致使当年日本对华输出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三点八。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舆论的报刊，纷纷发表言论，要求抗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对内政策。九一八事变刚一爆发，罗隆基写了《沈阳事件》一文，就日本侵略中国一事批评国民党当

局的内外政策，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他说：“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具体的救急办法，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我们希望有个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来暂时负担国事，做政治上的应急的过渡办法，这里，一八七〇年法国的国防政府是个前例”。十月中旬，王造时发表名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提出了他的“两大救亡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九一八”后，知名人士马相伯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提出：“我民国主权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彻底充分表现，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分裂和动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军向黑龙江进犯时，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抗战，给进犯的日军以重创，成了风云一时的抗日英雄人物。全国各地纷纷捐款援马抗日。同年十二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人，在总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和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在江西南都起义，参加红军。

上述形势，冲击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这时，国民党内各派军阀政客的纷争更加激化，反蒋各派都乘机向蒋介石集团发起攻击。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九一八”之前，就已在广东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九一八”后，他们更利用全国的民气，极力逼蒋下野。九月下旬，宁粤双方在“共纾国难”的幌子下，开始举行谈判。粤方同意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但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蒋介石

必须“通电引咎，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第二，必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调与粤方有历史关系的十九路军进驻上海及京沪铁路沿线。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双方代表在上海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蒋介石下野问题仍是争论的中心之一。会议最后议定，双方各于所在地点克期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在南京开四届一中全会，处理双方一切提案，并改组政府。十一月南京和广东分别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粤方举行的大会上，倒蒋气氛愈加浓厚，会议通过议案：“必须蒋中正践言实行下野，并解除兵柄，如蒋不下野，则在粤组织中央党部”。有人甚至动议“永久开除蒋中正、张学良党籍”。

在全国抗日运动的怒涛冲击下，也在国民党内反蒋派别的咄咄进逼下，蒋介石考虑到对己的不利形势，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实行下野。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会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十二月下旬，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林森孙科等就职，广东通电取消在粤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组成所谓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国民党内更趋混乱。胡汉民、汪精卫滞留香港不肯赴京，桂系、粤系军阀仍然各霸一方。广东陈济棠提出西南五省“大团结”的倡议，企图乘机扩大地盘；蒋系的何成濬则发起九省“联防”的计划，与陈对抗；张学良也联合阎冯旧部提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口号。军阀政客相互争斗，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

严重的危机之中。

三 一二八上海抗战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在上海点起战火。其目的是借此转移国际上对它侵占我国东北的注视和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它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取得一个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军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违背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意志，奋起抵抗。这就是一二八事变。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仓皇宣布迁都洛阳。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工人和广大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斗争。上海总工会发布了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在上海的日本工厂、商店、机关和住宅工作的中国工人、职员、雇员等都实行了罢工或离职。全上海各界人民展开了巨大的捐献运动和支前运动。宋庆龄、何香凝发起捐制棉衣，五天内就制成三万多套，送至前线。抗战期间，国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款项达七百余万元。上海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群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协同十九路军作战。

由于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和强有力的支援，上海抗战取得重大战果。到二月底，侵沪日军增到十万人，而中国十九路军连同后来自动参战的一部分第五路军，总共不足四万人，武器装备更不如日军，但却坚持抗战一个多月，杀伤侵略军一万多人，打得日军三易主帅而不能有所推进。战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蕴藻浜一处阵地上六

十名士兵，在危急的时刻，全体用火油濡湿衣服，负巨型炸弹，猛扑日军阵地，使敌军阵线崩溃，六十人全部殉国。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重新上台。蒋介石先前辞职下野，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他在下野之前，就为复职做了周密的布置。他本人虽然飞回浙江老家，但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仍为其亲信所把持，不得蒋的同意，军队无法调动，财政也周转不灵。到“一二八”前夕上海局势紧张的时候，蒋的亲信党徒便乘机叫嚷，促蒋复职。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汪精卫赴杭州与蒋介石会晤，双方达成权力分赃的协议。二十一日，蒋、汪联袂入京。经国民党中央会议决，一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长），宋子文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随后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这样，蒋汪合作，重新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实权。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筹划结束上海的战争。

国民党政府对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不给以任何实际上的支持，不派军队增援，不给补给。何应钦还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通令各部队说：“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国民党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发十九路军军饷，并截留各地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捐款。国民党政府还对空军发出密令：“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国民党政府海军当局甚至与日本海军达成“互不攻击，以维友谊”的协议。

由于国民党政府按兵不动，坐视不援，十九路军伤亡日重。这时大批增援日军开到上海，组成上海派遣军。

三月一日，日军开始全线总攻击，并在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于三月二日放弃庙行、江湾、闸北阵线，撤至昆山至福山一线。三月十四日，经英国公使兰普森斡旋，中日双方决定自即日起停止军事行动。三月二十四日，中日双方开始正式进行停战谈判。五月五日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正文共五条，附件三件。根据协定，“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这就是说中国军队只能留驻在昆山、苏州一带，而不能进驻上海。根据协定，日本军队应撤退至一二八事变之前驻扎区域，但又规定“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这就是说日本侵略军可在上海驻扎并扩大其区域。除正式协定外，还有三项谅解：（一）中国取缔抗日；（二）中国十九路军换防；（三）浦东及苏州河南岸中国不得驻兵。

《上海停战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正如当时报纸评论所指出：“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误国祸国，政府尤为罪魁”。因此，这个协定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五月三日，协定正式公布前，上海群众痛殴了国民党谈判代表郭泰祺，表示强烈的抗议。五月九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代表全中国劳苦群众，否认这一卖国协定，号召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卖国政府，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的侵略。

蒋介石国民党之所以破坏上海抗战，与日本侵略者

寻求妥协，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进攻红军，消灭共产党。所以，协定一签订，蒋介石马上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后来蒋介石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自我供称：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起的“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国民党面临“两个战争”，于是，“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六月十八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叫嚷：“‘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他的“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因此，他要求部下“专心一志剿匪”，宣布“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正是在这样的反动国策下，蒋介石对红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而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则不断地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夺。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

四 国难会议和宪政运动

在“九一八”后掀起的全国抗日反蒋怒潮中，中国人民中最急进的派别，不只要求抗日，同时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中间派别也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非常不满和愤慨。他们企图在国难深重人民愤恨的情况下，以合法斗争的方式，要求国民党政府改革内政，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反蒋派，也标榜民主政治，作为反对蒋介石和获取本集团利益的一种手段。社会上的民主派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一致呼吁召开国难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国民救国会议之类的会议，以争取实现他们的主张。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各界人士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等六十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宣言，并连续发表通电，申述自己的主张。他们认为招致日本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国内一部分人之集团，标榜党治，掌握政权，自属于统治阶级，而无视大多数国民之国家主人地位”。他们要求国民党“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等自由，“万不宜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

此后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陆续成立了一批要求民主宪政的团体。当时有的报纸曾把上述这些活动称为中国的一次宪政运动。

对于上述抗日和民主要求，国民党当权派极力抵制。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答应召开国难会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国难会议由国民政府于半个月內召集，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召集国难会议。会议的召集由行政院办理。参加会议的会员“由国民政府就全国各界富有学识经验资望之人士聘任之”。

国民党政府召开国难会议的命令颁布后，许多民主人士和民族资本家继续努力，争取借开会之机实现自己的主张。王造时、史量才、沈钧儒、黄炎培、荣宗敬、刘鸿生、穆湘玥、李璜等六十二人提出一项《救济国难之具体主张》。对外他们主张：不辞任何牺牲，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之完整。为贯彻此项主张，“应以武力自卫为主，以国际折冲为辅”。对内他们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在宪政未实施以前，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设立民选的国民参政会监

督政府，筹备宪政并于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的宪法。

国难会议于四月七日由汪精卫主持，在洛阳召开。原定会员为二百二十七人，到时出席者仅一百四、五十人。主张抗日民主和不满蒋汪把持会议的人，几乎都没有参加。在讨论国内政治问题时，国民党分子张继发言，他说：“现在唯一希望，全国国民应一致帮助本党完成革命使命，同时督促政府，切实施行地方自治，以树宪政基础”。会议以这个发言做为讨论的终结。这样就把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完全否定了。关于会议要讨论的“御侮”问题，最后做了这样的决议：“凡侵害国家政治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之敌人，政府应用武力与外交，抵抗到底，有违上述宗旨之条约，概不得签订”。“在政府努力实行上项原则之时期内，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概应尽最大力量，赞助政府，共同御侮”。这表明国民党政府要坚持现行的屈辱妥协的对外政策，不准人民起来抗日。会议于四月十一日闭幕。

这次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的压制破坏下，如昙花一现，无结果而终。这次会议表明国民党对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是决不肯改变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给人民任何民主权利的。因此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

五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的错误政策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在日益发展。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宪法大纲还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宪法大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

大会还通过了劳动法、土地法以及经济政策等重要法律文件。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关于经济政策规定：苏维埃政府“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现不实行国有，但由工人“实行监督生产”；保证商业自由，但“严禁商人的投机和提高价格”；对于同非苏维埃区域的贸易，政府不实行垄断，而“实行监督”；“极力帮助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

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等六十四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五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领土内已经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的政府，它是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之下，大会通过的宪法以及土地法、劳动法等文件都包含有“左”倾错误的内容。

“九一八”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加上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这些构成了对革命非常有利的形势。这时，共产党如果能够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高举抗日的旗帜，在大力发展红军和根据地的同时，充分发动和领导群众，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把整个革命大大向前推进。

但是，当时党中央已经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之下。一九三一年月下旬，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王明等人也主张抗日，但对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开始就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反苏联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提出“武装